

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

——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為例

朱善杰

[提 要] 通過調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的青少年的文學環境發現,自改革開放至今其發生了驚人變化。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變化的發生都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且都有標志性事件。變化的趨勢是文學環境越來越衰微,甚至有消失的可能。一個鄉鎮的文學環境,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青少年的知識接受和精神成長,乃至他們一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鄉鎮文學環境的變化,將會改變青少年精神成長的軌跡,進而影響該鄉鎮人口的“質量”。該鄉鎮並非孤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被看作是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這讓人不無隱憂。

[關鍵詞] 鄉鎮 青少年 文學環境 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 C91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67 - 11

引 言

我的家鄉位於山東省南部的一個鄉鎮。多年來,我一直都比較關注家鄉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主要基於兩個常識性問題考慮:一是文學對青少年的成長影響深遠;二是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巨大。當然,也與自己一直從事的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工作有關。

本文使用的文學環境的概念,主要指的是文學的一種空間和氛圍,甚至可以說,就是文學本身。它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該鎮青少年所置身的社會環境中的文學部分,主要涉及家庭(如家中藏書、故事、手機、電視等)、學校(如課堂教學、圖書館、黑板報等)和社會(如書店、書攤、網吧等)這三者,本文在分析該鎮的情形時所用的“文學環境”一詞,都是指這層意思;二是該鎮的青少年和上述文學環境的互相作用及其結果,本身又構成了文學活動的社會環境的一個部分,本文在結尾部分的討論中所用的“文學環境”一詞,取的是這第二層意思。

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中認為:“個人經驗本身並不重要,但把個人經驗問題化是一個重要方法。我們關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現在關鍵是從哪裡開始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個人自己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一個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①這給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借鑒和支持。因此,我試圖“把自己作為方法”,“把個人經驗問題化”,以民族志的方法來觀察和描述家鄉青少年的文學環境。

當我在 2000 年前後明確意識到家鄉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已發生巨大變化後，就開始利用假期返鄉的機會來做田野調查。集中調查主要是在 2003~2005 年間做的，當時採取了問卷、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法，調查了該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狀況，主要圍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空間展開，因為它們是青少年主要的活動場域，調查這三者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怎樣的文學環境與資源。選取家中藏書、電視、VCD 碟片、手機、語文課、語文老師、作文、日記、書信、黑板報、輔導書、課外讀物、閱覽室、圖書室、文學社團、書店、書攤、電影院、錄像廳、網吧、廣告、街頭標語、宣傳欄、春聯、民間故事等作為調查指標。考慮到農村青少年的文學閱讀主要發生在初中階段，因為小學階段前期主要任務是識字，至於高中階段，文學閱讀又被高考擠壓和異化，那麼，調查主體也就選擇了初中生。當時在鎮上的兩所中學共做了 150 份調查問卷：在“一中”，三個年級中每個年級隨機抽兩個班的各 10 名學生來做問卷，共做了 60 份；在“二中”，三個年級中每個年級隨機抽三個班的各 10 名學生來做問卷，共做了 90 份。同時，還做了一些訪談：有隨機訪談，也有專訪；訪談對象有學生，也有老師，還有家長和學校領導。此外，還去蔬菜批發市場、集市（五天一次）、年集（一年一次）、廟會（一年一次）、書攤、縣城新華書店進行了實地調查。疫情三年，做田野調查的條件不具備，因此調查主要以電話和網絡的方式進行。最近的一次實地調查是在 2023 年 1 月份。此時，2022 年 12 月的“大流行”已在該鎮結束，就利用春節返鄉的機會做了一些訪談。

調查發現，該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是驚人的，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且每一階段變化的發生都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並都存在標志性事件：第一階段是 1980 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該鎮實行至 1990 年代中期該鎮開啟“市場化”之前；第二階段是該鎮“市場化”後到 2010 年代初該鎮“房地產化”之前；第三階段是該鎮“房地產化”後至今。自然地，標志性事件就是：隨著 1990 年代中期蔬菜大棚種植在全鎮的普及和與之相配套的蔬菜批發市場的建立而開啟的“市場化”；隨著 2010 年代初該鎮第一個農村示範化小區的建設而拉開序幕的“房地產化”。問題是，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在短短幾十年間怎麼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其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關係為什麼如此密切？

一、“市場化”之前

該鎮境內以平原為主，也有少量山地。由於很多公路在鎮駐地交匯，所以交通便利，坐車去縣城只需十幾分鐘，到所屬的地級市也就是兩個小時左右。該鎮由於土地肥沃，在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產糧區，境內農民直到 1980 年代末還以種糧為主，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為主的農村鄉鎮，屬於傳統的農業社會。

在這一階段，該鎮只有一所初中。這是一個文學的“春天”。初中生們都對文學有著一種強烈的熱愛，而語文老師在青少年的文學接受和精神成長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常會成為學生的“偶像”。學生往往會因為喜歡文學而喜歡語文老師和語文課，也會因為喜歡語文老師和語文課而對文學產生興趣。

學校普遍重視學生的寫字和作文，學生也很喜歡寫作文，“練筆”在當時的中小學校園裡是個很流行和時髦的詞。很多學生自己課下自覺練筆，還經常把自己的習作單獨拿給語文老師求教。下面是一位受訪者回憶當年寫作文的情況：

我讀小學的時候，姑姑讀初中，當時聽她同學說，姑姑的作文寫得很好，多次在學校的作文比賽中獲獎。爸爸沒有很多文化，就希望我能比他強。本來那時小學三年級才學習寫作

文,但是一年級下半學期,我就在爸爸和姑姑的鼓勵下,試著寫作文了,我當時識字還很少,只能用一些簡單的字詞和句子,記得寫的第一篇作文是《收麥子》,全篇僅30多個字,但是卻得到了姑姑的稱贊和爸爸的獎勵,那個晚上幾乎沒有睡著。後來我就逐漸對作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的夥伴中也有幾個喜歡寫作文的,我們就經常一起比著寫,看誰寫得好。

1987年,參加“全鄉小學生作文大賽”時,我寫了一篇看圖寫話作文——《在烈士墓前》,結果出乎我的意料,竟然得了一等獎;小學畢業前夕,我寫的一篇看圖寫話作文——《醫傷鳥》,獲得了山東省作文比賽優秀獎。兩個月後我到剛剛建好了教學樓的中學讀書,竟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同學中的“明星人物”和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很多同學向我請教寫作經驗,為此我們還經常五六個人在放學以後,聚集在學校的一個角落,討論如何寫作問題。

初二的時候,我們班在我(學習委員)和班長的牽頭下,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文學社,成員就十來個人,它也沒有名字,我們邀請語文老師當指導教師。大家一起討論寫作問題,一起辦黑板報和手抄報,後來得到了班主任的支持,出了油印報,雖然受物質條件限制,印刷的份數並不多,但很令人興奮。^②

1990年代以前,由於物質條件落後,中學還沒有專門的圖書室和閱覽室。書的借閱主要有三種方式:老師之間互相借書、學生之間互相借書、學生向老師借書。但在這種條件下,文學閱讀的氣氛是“熱火朝天”的。當時每個年級有四個班級,150個人左右,相互之間都很熟悉,有的同學還和高年級同學熟悉,誰有好書,很難藏得住。借閱方式有橫向的——本班級、本年級同學之間借閱,也有縱向的——不同年級同學之間借閱。往往因傳閱的人太多,書借出去後短期內收不回來,而大家又都非常愛惜書,書的主人就會在書被借出之前用報紙折疊個封皮把書包好,然後在封皮上寫上一行“請注意保護”之類的字樣,這樣才可放心借閱。但當同學把書還回來的時候,書的封皮經常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了,至於中間換了幾個,已無從得知。

同學們會把在各種課外閱讀中學來的知識——詩歌、散文、名人名言等——用筆記本認真記錄下來,以便輪到自己出黑板報的時候派上用場。大家都爭著出黑板報,因為在那裡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華”,黑板報也就更新很快。黑板報下面是“學習園地”,裡面張貼著學生的課外習作或寫得不錯的作文,誰的習作要是能貼在那裡,是很開心的。

初中生在家庭和社會所接觸到的文學環境是怎樣的呢?

父母都很重視孩子的學習,但不是非要孩子讀大學不行。他們的想法很樸素,就是讓孩子能多懂一些文化知識,不要當文盲。而孩子是怎麼在家長的“要求”下不自覺地接受文學的啟蒙的呢?下面是一位受訪者回憶小時候在家裡受到文學啟蒙的情況:

問:記得青少年時,我們都喜歡看文學類的故事書,當時你是附近幾個村莊很出名的“小文學家”,你走親戚時還到我們鎮的村子講過故事。你寫的作文也最好,我還拜讀過,老一輩人都說你最有出息。今天你能大致描述一下你的文學“成長之路”嗎?

答: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爸爸文化水平很低,小學畢業,由於成分不好不能上初中,父母把對知識的渴望全部轉移到我的身上,盼望我能彌補他們沒有機會讀完書的遺憾。

從我兒時起,爸爸就從當時的新華書店買回來《西遊記》,每天晚上給我講故事聽,那是1982年,我五歲。我最初的文學啟蒙就是從聽“故事”——確切地說就是從聽《西遊記》——開始的。當時最著迷的一段時期,我幾乎天天圍著太陽轉,盼望它快點落山,星

星能出來，這樣爸爸媽媽就會從田裡勞動回來。爸爸吃飯時，我就會繞在他的身邊，恨不能幫他吃下幾口，讓碗裡的飯盡快沒有了，這樣爸爸就會放下飯碗給我講《西遊記》的故事。

那段歲月使我受到了很好的文學的啟蒙，爸爸每天晚上只給我講一段故事，所以三本《西遊記》，足足讓我“享受”了半年多。記得當時爸爸還教我背誦《西遊記》裡面的詩句，我雖然似懂非懂，但是感覺那些話非常美，非常好聽，就很認真地、一遍遍地背誦。後來我的一些夥伴也來我家，和我一起聚精會神地聽我爸爸講《西遊記》。

等全部聽完了《西遊記》，我已六歲了。這時爸爸再隨便拿出裡面的一個故事來，給我講上一遍以後，我就能記住了。夏天的晚上，當大人和小孩子們在大路邊乘涼的時候，我就給他們講述《西遊記》。我講的時候，有很多地方還引用書中的原文，詩句也會在適當的時候背誦出來幾句，還不時地運用一些手勢語。我也學著爸爸的樣子，每天晚上講一個故事，在它的重要關節會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來嚴肅地結束自己的講述。如你所說，我走親戚時，也掩飾不住自己要講故事的慾望，就講給大家聽，所以才會一個傳一個，我也成了附近很有名氣的“小文學家”。^③

青少年所受到的文學的熏陶和浸潤是和所置身的時代的文學氛圍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此時，該鎮的農民一年收穫兩季作物，農忙季節和農閒時間相對比較集中。人們對傳統節日非常重視，特別是春節，持續的時間最長（一般為一個半月），其間人們走親戚，逛朋友，寫春聯，看戲曲，扭秧歌，賽歌舞，猜字謎，鬧花燈，講故事，到處都其樂融融。孩子們更是踴躍參與，快樂非凡。節日的閑暇和氛圍，正為文學名著的閱讀、講述和文學故事的接受提供了“溫床”。

人們會在晚飯後聚在一起聽說書、講故事、猜謎語、講笑話……孩子們周圍有一批會講故事的老人。夏日晚上，在村頭巷尾、大路旁、小橋邊都有一些固定的免費“書場”，在那兒聽村裡“有文化”的老人講故事，主要是古典文學評書、古代傳說、神話故事和民間傳奇等，像《千里眼和順風耳》、《乖媳婦》、《禿尾巴老李》、《聚寶盆》、《石龍山傳奇》等；也有現代故事，像《白毛女的故事》、《葫蘆娃娃的故事》、《鐵道遊擊隊》等。

1980年代初，集市上有戲班和書場。戲班經常演出《坐山雕》、《白毛女》、《放下你的鞭子》、《小放牛》、《親家母頂嘴》等，其中很多台詞屬於說唱文學，語言押韻，也很鮮活，一些孩子還會似懂非懂或根本不懂地跟著劇中人“鸚鵡學舌”。一直到1990年代初，集市上還常有評書、大鼓、小鼓、快板等說唱文學，評書有《封神演義》、《大西唐演義》、《三國演義》、《穆桂英掛帥》等，快板有《小白龍下凡》等。

一些村子在過節或有青年男女結婚等喜慶日子時，會出錢請文化站的人在村裡專門的一片空地上搭起架子放一兩場電影，這幾乎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民間文化生活方式。一旦要放電影，附近好幾個村子的人都口耳相傳地搬著大大小小的椅子、凳子奔走過來，很多孩子更是早早地吃過晚飯，興奮地搬著凳子一路跑著過來。

1993年以前，鎮上有一家新華書店，^④有三間房子大小，隸屬於縣新華書店，雖然它裡面書的種類有些少，但一般的書還是能夠買到的，包括文學類的書。

集市上好多家書攤，賣的有舊書，也有新書；有文學作品，也有日常生活用書；有文學名著，也有武俠和言情小說。由於新華書店的書相對書攤，價格要貴一些，所以去新華書店比較多的是老師，去書攤比較多的是初中生。

另外，中小學生還有兩個買書途徑：一個是去縣新華書店，當時由於交通不發達，一般初中生不容易去，一旦誰去過一次，回來後能給同學們津津樂道地描述上好幾天。另一個是通過郵局訂書，主要有《少年天地》、《少年報》、《語文報》、《作文通訊》等。

青少年常會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去電影院看電影。1993年以前該鎮有一家電影院，叫“大禮堂”，能容納300多人。它始建於1950年代，屬鄉政府文化站管理，既用來當作政府的大型會議、節日慶典等活動場所，又用來放電影。當時放映的很多電影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像《芙蓉鎮》、《高山下的花環》等，一些青少年看完電影以後，覺得還不夠過癮，就會再想方設法——向老師和同學借或到舊書攤上買——找來電影的文學劇本看。

初中生還很關心街頭的標語和宣傳欄，裡面的內容很豐富，有新聞也有生活小知識，其中不少內容是用文學式的語言寫的，有些中學生對此感興趣，會在下面站著看。

春聯有文化內蘊，文學性強，字句押韻而對仗，很有意境和審美內涵，深得青少年的喜愛，有的還為此喜歡上了書法。該鎮有一位毛筆字寫得最好的人，當然他寫得春聯也最好。每年當過了臘月二十，他家裡人就特別多，有時屋子裡會有五六個中小學生在看他寫春聯或跟他學寫毛筆字。對那些感覺特別好的春聯，他們往往會背下來，留著寫作文時用，像“紅梅含笑迎春節，瑞雪飛舞兆豐年”、“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等。

不難發現，此時農民從事的仍然是傳統的農業生產，農忙和農閑的界限比較分明，人們的生活節奏較慢，有講故事和聽故事的餘裕、心情、興致和空間，因此，節日尤其是春節就非常有意義，春聯很“文學”；人們普遍尊重和渴求知識，書籍被當做珍惜物品，家長格外重視孩子的教育，希望孩子讀好書、上好學的心情極其迫切；語文老師非常重視學生的閱讀與寫作，書店、書場、戲班和電影院等都處於一種欣欣向榮的狀態。同時，文學的內容——故事（存在於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等中）和創作（存在於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中）——鮮活有力和充滿溫度；而文學的形式（載體）——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和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豐富多彩且生機勃勃。文學環境發展的方向與經濟很“默契”。因此，青少年也就置身於一個比較好的文學氛圍中，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和社會，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雖然物質簡陋但精神生活豐富的學習條件，知識和有知識的人都被推崇。

二、“市場化”後至“房地產化”之前

但從1990年代初開始，該鎮農民開始種植大棚蔬菜，種植面積在短短幾年間迅速擴大，隨之蔬菜批發市場建立，於是該鎮逐漸成為“山東南菜園”的主要生產基地和集散中心，所產蔬菜主要供給南方的蘇州和上海兩大城市。同時，蔬菜包裝、商貿、建材等生意也發展很快，隨之出現的還有食品加工、交通運輸、蔬菜加工等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逐漸形成了農業的工業化生產和市場化經營鏈條，開啟了“市場化”之路，開始向現代農業社會和“城鎮化”過渡。

隨著經濟發展和學齡人口數量的增加，該鎮於1995年又建立了一所初中，為了區分，此前的中學被稱為“一中”，新建的被稱為“二中”。兩所中學分別處在縱橫交匯的兩條公路的旁邊，相距不到一公里。“一中”的規模比“二中”的大，人數最多的時候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三個年級共28個班，有1200多名在校生；到2005年，三個年級共22個班，有950名在校生。“二中”人數最多的時候也是1990年代中後期，三個年級共22個班，有1000名左右在校生；到2005年，三個年級共18個班，有835名在校生。

2004年在這兩所中學做的問卷顯示,認為在語文課上“學到了字詞”的學生比例大於認為在語文中得到了“美的享受”的比例(前者為21%,後者為7%)。語文課成了語言知識和閱讀技巧課,語文老師也有難言的苦衷——“之所以這麼講,這裡也有一個基本的教學目的,即教會學生如何應對語文考試中一道分值很重又很難的常規題型——‘現代文閱讀’。我們的教學是緊緊圍繞著中考而展開的”。^⑤那麼,學生在這樣的語文課上得到的文學熏陶有多少呢?問卷中,“在語文課上因老師的講解而感動、產生心靈共鳴、震動甚至震撼”的學生為32%,而“從來沒有過的”學生為68%。

作文是初中生的“文學創作”。在兩所中學,每個年級的學生每周都有一次作文課,一般安排在下午,兩節課的時間。初三的作文課是限時作文,第一節課學生用來寫作文,第二節課老師用來當場講評。初一、初二的作文課,一般是老師先講評上次作文的情況並說明本次的寫作要求,然後把剩下的時間留給學生寫作,並要求學生把作文在下課前交上,如有的同學實在寫不完,還可以在課下繼續寫,所以時間相對自由和寬裕一些。以上三個年級的習作,都是命題作文的強化訓練。老師還讓學生買了一些作文選,目的是讓學生學習寫作技巧。有的學生的桌面上放著好幾本作文選,有《優秀作文》、《新概念作文大全》和《作文大全》等。

除了作文,還有兩類寫作是日記和書信。日記不是學生在作文課上寫的,而是被當作課下作業。書信是青少年能較熟練掌握的一種文體,它與日記有相同之處,即容易抒情,文學因素多。

閱讀和背誦主要是在語文自習課上。自習有早自習和下午自習兩種,時間都是按科目分配好了的。一般每周有三次語文早自習,下午自習每周兩三次,老師會來隨堂輔導。但幾乎每次語文自習課上,老師都會“抓著”看其他科目的書或做其他科目作業的學生。

問卷中,“老師從來不推薦美文”的比例為65%。之所以不推薦學生閱讀美文,老師有著自己的看法:“以前也嘗試著做過這方面的努力,後來逐漸在實踐中發現它非常不現實:一是學生沒有時間讀,他們在學校裡要忙著應付各種課程、作業和考試,回家以後大多選擇看電視、出去上網或幫家長幹活等,即使推薦了他們也根本不去讀;二是現在很少有學生喜歡讀美文,並且他們也沒有能力接受和理解它,很多學生根本就不知道文學為何物。對於《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在7~9年級,可通過考察學生對形象、情感、語言領悟程度,來評價學生初步鑒賞文學作品的水平’^⑥的要求,根據我的語文教學經驗,覺得它在實踐中很難做到,到頭來也只能是紙上談兵而已。”^⑦

課餘活動時看課外書的學生不多,做作業的比較多。一次午飯後,在初一的兩個教室發現:21個學生中,有12個在做數學、英語等作業,四個在聊天,五個在看課外書,但沒有看文學類課外書的。對“課餘活動時間你和同學討論文學或寫作問題嗎”,選擇“經常討論”的為8%，“偶爾討論”的為20%,從不討論的為69%，“其他”的為3%。

“一中”有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閱覽室,是在1990年代後期逐步建立起來的,但不對學生開放,藏書大都是1980或1990年代出版的。問卷顯示,“知道學校有閱覽室和圖書室”的學生為31%，“從學校圖書室借過書的”學生為0。閱覽室和圖書室平時鎖著門,沒安排專職圖書管理員,只在上級教育部門來檢查評估時才開放。“二中”有閱覽室但無圖書室,它是學校在1999年為了迎接縣、市教學檢查評估而建起來的,裡面的書和雜誌加起來也不過幾十本。

兩所中學到處都可看到黑板報。初二的最好,內容豐富,更新較快;初一的更新頻率跟初二的差不多,但內容不如初二的好;初三的更新很慢,有時兩三個月才更新一次。黑板報內容大多是學生的創作或從書中摘錄的詩歌、散文、名言警句等,也有一些學校的規章制度。

“一中”有一個文學社團。在“你們學校有文學社團嗎”的問卷中,選擇“有”的為 31%,選擇“沒有的”為 35%,選擇“沒聽說過,不知文學社團是什麼”的為 34%。在“你參加過文學社團嗎”的問卷中,選擇“參加過”的為 10%,選擇“沒參加過”的為 90%。“二中”沒有文學社團。那麼,學生們走出校園,回到家中,有什麼樣的文學環境呢?

小時候能聽到大人們講故事的孩子已很少了,他們很難在家裡接觸到文學讀物。學生家中大多沒有藏書,家長也基本不看書。鎮上已沒有書店,縣城還有兩個,但絕大多數初中生都沒有跑到縣城去買書的經歷。1995 年前書攤非常繁榮的景象已一去不復返。2000 年後,書攤經營很不景氣,數量在迅速減少。2004 年,書攤上賣的大多是武俠、通俗讀物、農業科普讀物、教輔書等。一位書攤主人說:“我父親賣書的時候,有很多人喜歡文學作品。那時雖然人們很窮,但是大家會湊錢買書輪流著看或相互換著看,有時我父親還會送書給一些家裡比較窮的學生,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書,但沒有錢買。這些學生常常會在書攤前呆上一天,慢慢地翻著書看,有的還很不好意思,只是到了下午該收攤的時間也不買,我父親很感動,就會送一些書給他們。現在,人們幾乎忙得來不及看書。中小學生在學校裡光老師給訂的輔導資料就做不完,而放了學又要幫著家長去市場或蔬菜地幹活,有的也遊手好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買書和看書,我在這裡有時一天也見不到一個學生。偶爾有來買書的青少年,也是買輔導類的書,像作文選和《文言文全解》等,基本不買文學作品。武俠小說偶爾有社會上的青年人來買,他們大多是看店鋪的個體戶。”^⑧

青少年如何打發學校和家庭以外的時間呢?問卷顯示,“逛街”的學生比例為 43%，“逛書店或書攤”的為 6%，“上網”的為 27%，“其他”的為 24%。此時該鎮沒有電影院和錄像廳了,而文化站形同虛設,不搞普及文學和文化教育的活動。網吧興盛起來了,學生中“喜歡上網”的為 62%，“不喜歡”的為 38%。上網的學生中,“玩遊戲”的為 53%，“聊天”的為 25%，“看網絡故事”的為 13%，“其他”的為 9%。可見,初中生離“新課標”規定的“能利用圖書館、網絡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和資料”^⑨的目標還很遠。青少年除了對逛街和上網等感興趣以外,對其他事物很少關注。80%以上的初中生不注意帶有文學色彩的街頭標語和宣傳欄裡的內容,62%的學生對春聯不感興趣。

不難發現,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隨著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蔬菜市場的建立,人們變得越來越忙,生活節奏變得越來越快。同時,學校教育急功近利的傾向日趨強化。從而,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在該鎮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急遽邊緣化的趨勢,它的社會影響力也開始迅速減弱:家長已被金錢“洗腦”,只重視掙錢而忽視了孩子的讀書和上學,更不用說文學熏陶和教育,對知識的態度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青少年聽故事的空間——飯後的街頭巷尾、節日期間的親戚往來已被極大地縮小了;春聯所營造的節日、文化和文學的熱鬧氛圍幾乎已不復存在;學生的語文課、閱讀課、作文、日記和黑板報、課外閱讀等受因受中考“指揮棒”影響作用的明顯加大而導致其所內涵的文學“元素”大量“流失”;圖書館和閱覽室成為“花瓶”,文學社團形同虛設;書場、電影院、戲班已銷聲匿跡;鎮上的新華書店已倒閉,集市上的書攤數量銳減且岌岌可危;電視正處於興盛時期,成年人忙著看電視,青少年也想看,也就出現了大人小孩間爭奪“遙控器”的激烈場面;網吧作為新興事物,尤其受青少年“青睞”,有的因被網遊吸引而常常出入其中、流連忘返甚至夜不歸宿;如此等等。同時,也可以看到,文學的內容——故事(存在於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等中)和創作(存在於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中)——已發生了變化,前者開始變得“稀薄”甚至罕見,後者日益被中考所“異化”;而文學的形式(載體)——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和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也都發生了變化,從總體上看,從豐富變得單調,從鮮活變得“八股”。雖說在 1980 年

代和 1990 年代初,文學也並非處於農村文化生活(或稱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但是,它在該鎮是很“尊貴”的,特別受到年輕學生的向往,也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能給青少年營造一個相當不錯的文學環境。而此時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則如上述調查所顯示的,發展的方向與經濟的“相反”,變得越來越衰敗,越來越壞;家庭生活裡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文學或培育文學興趣的氛圍,學校的語文和文學教育越來越單調、乾癟和僵化,其他社會環境中的文學部分迅速凋零……

三、“房地產化”後至今

隨著蔬菜種植面積及產量連年不斷地“創造新高”,該鎮經濟獲得了極速發展,逐漸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龍頭”之一;隨著化肥、農藥、塑料薄膜生產技術的不斷“突破”和農業種植技術的不斷革新和提高,該鎮農業生產的工業化程度進一步加強;隨著全國房地產業的發展和農村示範化小區的建設,該鎮房地產業興起,步入了“房地產化”階段,由此完成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農業社會的轉型,“城鎮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而學生生源的逐年銳減,最終導致了“一中”併入“二中”並把其名字改回 1995 年前“一中”的名字。隨後,“一中”被賣給了當地一家私人企業搞房地產開發,在原址上建起居民樓對外出售。而生源的減少,一方面與學齡人口數量減少有關,另一方面與 2008 年後當地所在的縣大力發展房地產業有關。房地產業興起以後,入學政策發生了變化,學籍開始與房子掛鉤,鎮上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家長就到縣城買房,這樣孩子就有機會到縣城讀初中,而縣城的教育資源要比鎮上的好很多。房地產業不僅帶動生源的流動,也帶動了教師的流動。在兩所中學合併前,一些老師就已經開始流動到縣城新建的幾所中學當老師。兩所中學合併後,“一中”的部分老師進入“二中”,其他的則進入了縣城的中學。由此,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變化最大的是學校的文學環境。隨著生源的減少和師資力量的流失,學校的教學質量開始嚴重下滑,學風也大不如從前。房地產業的興起和學籍政策的變化,刺激了人們去縣城買房。而逐年高升的房價,又讓一些買了房的老師背負了沉重的生活壓力。一些老師開始幹起了兼職工作,下班後有的擺小攤,也有的經營自家的店鋪,還有的開起了網約車,並把“第二職業”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語文課的整體水平在不斷下滑。學生在課上學到的真才實學大不如從前,語文老師在課上和班級裡營造的文學氛圍也遠遠不夠。當地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功能更加功利化,從上到下,從高中到初中,似乎只剩下應付升學考試這件事了,學校的一切活動都圍繞著中考的核心指標轉,一切圍繞著考試的指揮棒轉,學校成了“考場”或說“預備考場”。同時,教育資源的爭奪戰競爭激烈,升學壓力逐年加大,學校間升學指標競爭激烈,學校對老師在升學指標方面的考核更加苛刻,語文老師幾乎把全部教學都圍繞升學展開,哪裡還有時間、精力和餘裕去考慮文學社團的發展甚至有無?文學社團亦淪為“花瓶”,已不開展民間性的文學活動;黑板報的宣傳性在替代文學性。於是,構成文學環境的文學社團、黑板報、日記等的多樣性就在實質上逐漸地消失了,而語文課、課外閱讀、作文等所蘊涵的文學的豐富性也在慢慢淡出,日益變得單調和乾癟。

學生回到家裡,文學環境就更無從談起了。父母忙著賺錢,雖口頭上喊著讓孩子好好學習,其實在行動上並不真正關心孩子的教育,更不懂得培養孩子從小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常常是孩子哭鬧了,父母就隨手丟個智能手機過來,孩子就能立即不哭不鬧,專心玩手機,似乎手機成了最好的“保姆”。

鎮上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讀書最好的幾個少年,目前已成為父母教育孩子時的“反面教材”,

甚至人們的“談資”，不再是當年考上大學成為全村甚至全鎮青少年榜樣時的盛況。其中一位是在1980年代中期考上大學的，他是“該鎮中學”第一批考上縣一中和第一批考上大學的人，當時成為鎮上的大“明星”，大學畢業後留在省城濟南工作，現在已臨近退休，據他父母說其目前生活困頓，主要原因是沒錢給即將結婚的兒子買婚房，為此節衣縮食，東借西挪，焦頭爛額，可能退休後還要背上沉重的債務。另幾位雖具體情況不同，但總體“命運”相似。這些昔日的少年，曾一度是鎮上的“成功者”，而今卻成了鄉親眼中的“失敗者”。在此案例效應下，家長形成一種帶有偏見的看法，認為讀書不能改變命運。在此言傳身教下，孩子對讀書自然沒什麼興趣，還何談對文學的愛好。

2023年春節期間，我去一位親戚家做訪談，他住在鎮上的一個新小區，偌大的樓房裡，擺滿了家具和生活用品，但沒有什麼藏書。兩個正在讀初中的孩子的房間裡，只有課本和教輔書。在他眼裡，孩子讀書好了也沒啥前途，不但留在城裡工作機會小，而且即使留下來，生活都是個問題，2022年3~6月上海疫情期間的封控，他侄子剛從北京畢業到上海工作不久，幾個20多歲的男青年擠在群租房裡，每人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還要焦慮下一頓飯的著落，有一種過了今天沒有明天的惶恐。他堅定地說，他兩個孩子只要把高中堅持下來，就能上專科，不讀本科也不怕，畢業後在鎮上或縣城找個工作才叫實惠。

然後，我又去了住在鎮上另一個小區的朋友家，因為他家女兒正在鎮上讀初中。走進他家裡，發現兒子的房間裡有一些藏書，但都是與他工作有關的專業書。他兒子沒有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去省城讀了個職校，畢業後在縣城找了一個工作，他給兒子在縣城買了學區房，還給買了轎車。而他本人沒上過高中，但在村裡算是富人，根本看不上他那些考上大學的同學，更不用說村裡現在的大學生，認為他們不是窮酸就是面對失業困擾和壓力，過得遠不如他。他女兒的房間裡擺放著十幾本書，但都是各類詞典和教輔書，沒有文學類讀物。他說，女兒即使考上大學，畢業後也要回來就業，將來留在身邊，等他老了好有個依靠，因為他認為將來靠兒子養老根本沒門，雖然也不會靠女兒養老，但等自己年邁時，女兒在身邊多少是個依靠，同時他通過手機信息得知，當下城裡不結婚的女性數量在增多，他還是希望女兒將來能有一個幸福家庭，結婚生子，否則在他眼裡人生是不圓滿的。

從上述調查來看，當下青少年的家長雖然尚還年輕，也頭腦靈活，還生財有道，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條，不是在村裡蓋起樓房，就是在鎮上或縣城買了房，有的不僅自己有小轎車，還給兒子買了小轎車，生活已步入了小康。但他們對教育的偏見和執念已很深，且很難通過別人勸說而改變，由此造成對教育的普遍不重視甚至不信任，又太過於急功近利，只看眼前得失而缺乏長遠眼光，自然不會在家裡給孩子提供一個在其眼裡“根本無用”的文學環境。

至於社會方面，鎮上的書攤在2015年前後就消失了。在2023年1月的兩次集市上做調查，沒有發現一家書攤的蹤影。在2005年和2023年春節前的年集上，雖然時間跨度18年，春聯的內容在變化，但不變的是都是機器印刷。而1995年前，春節的集市上沒有一家賣印刷春聯的。

智能手機已成為當下新的流行娛樂工具，青少年通過它看短視頻或打遊戲。抖音、快手成為人們最經常瀏覽的APP，有的老人和青少年還成為了“小網紅”，在直播間有著幾千甚至上萬粉絲。如果說文學閱讀在第二個階段已被從社會層面上邊緣化，那麼在此第三階段已被完全忽視和放棄。智能手機似乎已成為人們最親密的“伴侶”，甚至到了一個人抱著一部手機可以輕鬆過一天的程度。父母和孩子在第二階段是搶電視遙控器，而在此階段則變成了搶智能手機。代際間的衝突，往往是由智能手機引起的。因為，父母知道短視頻或遊戲的危害，也了解到網上的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甚至不健康，就不想讓孩子沉溺於手機，雖然自己已是經常手機不離手，但是不願意孩子那樣。

可見,隨著房地產業的興起和學區房的興盛,學校教育變得更加功利化和貨幣化,教育資源進一步萎縮並分化。同時,人們急功近利和金錢萬能觀念變得極端化和固化,“讀書無用論”似乎在現實和“失敗者”那裡得到了“驗證”。於是,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已既不同於第二階段時的衰敗,更不同於第一階段時的繁榮,而是變得是荒蕪:家長已因金錢“中毒”很深,只絞盡腦汁地想著賺錢或買房,更加普遍地忽視了孩子的讀書和上學,至於那些“留守兒童”更是常處於“放羊”狀態,因此大人根本沒有心思、更不用說機會對孩子進行無意識的文學熏陶和教育,至於對知識的態度已產生了徹底改變,開始看不上讀書人,甚至出現了歧視在他們眼裡太窮酸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的苗頭;青少年聽故事的空間——飯後的街頭巷尾、節日期間的親戚往來已大面積壓縮甚至不復存在。雖說在 1990 年代中後期至 2010 年代初期,文學環境已發生了變化,開始衰敗,沿著向下的方向走,但是,至少人們還沒有對讀書人帶著有色眼鏡看,至少不會歧視考上大學的人,即使其畢業後找的工作不為鄉親欣賞。同時,學校教育還沒有如此急功近利化,因此,文學教育還有一定的空間和活力,也能營造一些文學環境。而今情況已發生“質變”,文學在該鎮已成為“過去時”,文學環境已接近於無,完全被佔據社會“中心”地位的經濟給甩出了社會發展的正常軌道。

結 語

通過對該鎮三個階段青少年所置身的文學環境的調查,可發現其在 40 多年間所發生的明顯而巨大的變化及衰微的趨勢,也可發現變化的發生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雖然,它是合力的結果,但其中最主要的力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市場化。該鎮在 1990 年代中期實現了從糧棉區到蔬菜區的轉變。蔬菜種植已打破時令,且一切都在“跑量”,^⑩菜農天天從早忙到晚;至於那些從事第三產業(運輸、商貿、餐飲乃至隨蔬菜至外地打工)的人,更是常常忙得腳不沾地。這使得人們的生產方式由過去有農閑和農忙之分的“季節性”變成“全年無休”。人們也由此步入了“快生活”的軌道,整天疲憊不堪、應接不暇地忙著與市場“賽跑”,與別人“競爭”,變得像工廠“流水線上的兵馬俑”,^⑪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聽故事和講故事呢?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一統天下”的智能手機,人們靠它接收碎片的信息和較低“笑點”的短視頻,而這種娛樂方式與文學的生成與傳播恰恰背道而馳,因文學需要生活的廣度、深度和時間的長度,是在“慢生活”的滋養下發生的。

當然,這變化也與“大”的文學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相對來說,該鎮的文學環境是一個較“小”的範疇,在此之外,還有一個“大”的,那就是整個社會的文學環境。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強調:“人的生活,風俗,觀念,都在改變;也不能否認,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藝術的更新。”^⑫就 1980 年代來說,在“科學的春天”裡,文學獲得了“大解放”和大繁榮,並充當著思想解放的先鋒。正是那樣的“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培育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學及其環境,進而營造了該鎮第一階段的文學環境。雖然,今天看來,它並非理想與完美,但至少,青少年對文學有興趣甚至激情與夢想,心中有文學圖景,對文學也有期待。後來,“人的生活,風俗,觀念,都在改變”,並且“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在更新,導致了全社會範圍內文學及其環境的變化,進而導致了該鎮文學環境的變化,從而出現了上文所述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情況。當然,“分力”還有學校教育改革、鄉村文化網絡變遷、新技術的出現等,這需要做更多調查。

文學不僅肩負著知識、文化、道德和情感的傳遞,而且肩負著對人思想啟蒙和精神塑造的獨特作用,這是其他層面上的上層建築所不能替代的功能。而文學環境的好壞,不僅影響了文學和文化的傳播,也影響著一個人文學素養的生成。事實上,一個人的一生都會不斷“回溯”童年和青少年

時期，並在那裡找到“來處”。因此，一個人在幼小和年輕時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和文化觀念，會在無形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們一生的心理結構和精神底色。那麼，一個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該鎮青少年的知識接受和精神成長，影響他們在成長期的心靈的滋養和靈魂的澆築，進而影響他們一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應該說，本文所調查的鄉鎮在當代中國並非孤例，可能還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無數在類似該鎮這樣的文學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他們青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在他們的精神世界裡所留下的印記，必將對他們“進城”以後的人生和生活產生影響，而對於其中那些將會從事與文學有關的工作的人，這種影響就更不必說了。陳平原在《文學如何教育》中在討論人文學的價值時，借了歐文·白璧德反駁斯賓塞的話：“儘管整個世界似乎都醉心於量化的生活，大學卻必須牢記自己的任務是使自己的畢業生成為高質量的人’，關鍵在於‘人文’，而文學又是關鍵中的關鍵。”^⑬可見，文學是關乎人口質量的，因此，文學教育就是“把控”人口“質量”的工作之一。在此意義上說，改變一個鄉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就是在提高一代甚至幾代人的“質量”，包括改變一代甚至幾代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精神結構和行為習慣。青少年是未來中國的中流砥柱，無數在類似該鎮文學環境中長大的青少年，必將影響中國的未來。

讓人困惑的是，該鎮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出的物質越來越豐，個人和家庭越來越富，人們有錢買書了，青少年也有零花錢了；同時，書籍的種類和數量越來越多，免費的電子書在智能手機上隨處可見；文化娛樂方式有了更多選擇；中小學教育改革越來越推陳出新且在推行“大語文”中重視閱讀……青少年的文學環境本應變得越來越好才是，然而實際情形卻難言樂觀。面對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繁榮——衰敗——荒蕪”的變化軌跡，以及在此過程中呈現出的文學環境迅速向下的驚人勢頭，難道不應感到隱憂嗎？

①項飆、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第215~216頁。

②訪談對象：男，大學畢業生，在該鎮初中畢業。

③訪談對象：男，碩士研究生，在該鎮初中畢業。

④1993年秋因無法經營而倒閉。

⑤訪談對象：男，“二中”初三語文老師。

⑥⑨國家教育部制訂：《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2002年，第20頁。

⑦訪談對象：男，“一中”初三語文老師。

⑧訪談對象：男，書攤經營者，在該鎮小學畢業。

⑩無論是蔬菜種植還是加工，都在追求“量”，尤其是後者，人們拿到的是按小時或天而不是更長時間段計算的“工錢”。因此，農業生產的“計數”已無異於

工廠生產線上的“計件”。

⑪許立志著、秦曉宇編：《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⑫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80頁。

⑬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年，第8~9頁。

作者簡介：朱善杰，上海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
上海 200444

[責任編輯 桑海]